

被转述的声音

——《螺丝在拧紧》的不可靠叙事与话语权力结构

元文静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摘要

文章以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为对象, 分析多层嵌套叙事与不可靠叙事的互动。外层男性叙述者通过控制信息与主题导向, 在结构上预设了内层女教师手稿的不可靠性; 而女教师在记忆空白、价值判断摇摆与人称转换等方面的叙述裂缝, 又进一步削弱了自身话语。外部操控与内部不稳定的叠加, 使核心见证者持续处于被边缘化的处境。不可靠叙事在制造悬疑的同时, 也折射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公共话语中的弱势处境, 揭示了叙事策略与话语权力结构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

《螺丝在拧紧》, 不可靠叙事, 叙事结构

The Mediated Voice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Discursive Power in *The Turn of the Screw*

Wenjing Yu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March 3,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urn of the Screw* by Henry James, focusing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multi-layered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unreliable narration. The outer male narrator, by controlling information and guiding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ly preconditions the perceived unreliability of the inner female governess's manuscript. Meanwhile, narrative gaps caused by the governess's memory lapses, shifts in value judgment, and change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further weaken her voice. The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framing and internal instability continually marginalizes the

primary witness. Unreliable narration thus not only generates suspense but also reflects the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women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of the Victorian era, revealing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discursive power.

Keywords

The Turn of the Screw, Unreliable Narration, Narrative Struc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螺丝在拧紧》发表于1898年，讲述一位年轻女教师在布莱庄园照看一对孤儿时，声称看见了幽灵，并逐渐相信孩子与幽灵勾连，最终以悲剧收场。情节表层的悬疑背后，隐藏着大量未解的空白与矛盾，为多种解读提供了可能。

由于其浓郁的哥特氛围，这部小说常被归入恐怖小说范畴。学界围绕其鬼魂真假与叙事可信度展开了丰富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类：反鬼魂说，支持鬼魂存在派以及心理现实派。这些互相矛盾却各有理据的阐释，凸显了文本本身的多义性与开放性，而这种多义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小说中大量的沉默空白与未解谜团。在叙事学框架中，这类沉默与歧义可归入不可靠叙事的范畴。自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提出这一概念以来，学界已从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两个方向展开探讨：前者以隐含作者的规范为衡量标准，后者则强调读者在解读中的建构作用。詹姆斯·费伦在布斯理论的基础上，将“不可靠”细分为事实、价值与感知三大轴上的六种类型，并指出不可靠叙述往往与叙述者的立场、知识局限或价值判断相关。

在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域，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不可靠叙事的分析维度。苏珊·兰瑟在其奠基性著作《虚构的权威》(1992)中指出，叙述声音的权威性与叙述者的社会性别身份密切相关，女性叙述者在进入公共话语时往往面临结构性的信任赤字。此后，玛丽-劳尔·瑞安、罗宾·沃霍尔等学者亦持续推进性别与叙事框架的交叉研究。就《螺丝在拧紧》而言，国内外研究者已注意到其嵌套结构对女教师声音的压制效果，但对外层叙述操控、内层叙述裂缝与性别话语权三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尚缺乏系统性的整合分析。

基于此，本文从“不可靠叙述”与“话语权”相结合的视角切入，借鉴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理论框架，对《螺丝在拧紧》的叙事策略进行细读分析。“话语权力”在此并非指单纯的政治压迫，而是指弥散于叙事形式、信息分配与阐释框架中的结构性力量，这是通过规定“谁的声音可被认可为可靠”来运作的。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探讨多层嵌套结构中外层叙述者如何通过框架、节奏与人物重塑预设不可靠性；第二章分析女教师叙述内部的记忆空白与人称转换等如何加剧其不可靠特征；第三章揭示这种结构性压制与内部裂缝的交织如何在性别权力格局中转化为女性话语权的持续消解。通过这一路径，本文旨在说明，《螺丝在拧紧》中的不可靠叙述不仅是文学技巧的产物，更与当时社会的性别秩序存在深层的文本呼应，从而为理解小说中的叙事含混性提供一种有效的解读路径。

2. 多层叙事与不可靠性的预设

不可靠叙事通常表现为叙述者在事实呈现、价值判断或立场稳定性方面与隐含作者或读者预期存在

偏离。《螺丝在拧紧》不仅通过多层次的嵌套结构制造这种偏离，更在文本开篇就让读者陷入信息被层层过滤的语境。

《螺丝在拧紧》从叙事起始，就巧妙地将读者与故事的“真相”隔离开来。女教师在布莱庄园的经历，并不是以直接的第一人称回忆呈现，而是被层层包裹在三重叙述结构之中：最外层是写作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我”，在圣诞夜聚会中倾听并记录了道格拉斯的讲述；中间层故事的讲述者道格拉斯，他声称自己曾亲耳听过女教师的叙述，并保留了她留下的手稿；最内层才是女教师的第一人称记录。

这个由内而外的叙事链条，并非机械的信息传递，而是一次次带有立场与选择的重读和重写。道格拉斯在揭示手稿内容前，就有意识地渲染它的来源与特殊性，他强调这是一位已离世二十年的女士的手迹，暗示叙述者的身份与命运；“我”则在记录时宣称自己仔细抄写并保证准确无误：“我后来把道格拉斯的故事仔细地抄写了一份，我将要讲给你们听的，就是根据我的手抄本的内容”([1], p. 5)。最外层的叙事者“我”通过显性声音强调其自身的抄写行为意在表明是他的抄录使读者得以读到手稿。因此可以说叙事者“我”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女教师叙事的独立存在性([2], p. 79)。由此，故事的核心真相在抵达读者之前，便已笼罩在外层叙述的主观滤镜之下，读者必须穿过多道由不同叙述者立场构成的屏障，才能接近事件本身。

詹姆斯在小说开篇，用大量篇幅描绘道格拉斯讲述前的场景：封蜡的手稿、围炉的听众、刻意的延迟叙述。这种布局不仅制造悬念，更悄然提示故事已经历过多次加工与再包装。换言之，不可靠性在情节展开前，就已经在叙事结构中被布置好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外层叙述者在内容上进行了主动介入和改写。而这种介入并未为内层叙述者提供背景支持与真实性背书：他们不仅未能强化女教师的权威，反而在多处削弱了她的独立性。

处于叙述结构中间层的道格拉斯对叙事内容进行了控制。女教师手稿所讲述的故事是不完整的，而道格拉斯会补充手稿中缺失的重要信息，使故事的理解不得不依赖他们的版本。例如，女教师在手稿开头提到：“到城里去接受了他的聘任之后，我连几天心情依然不好受，动摇不定，觉得自己确实犯了一个错误”([1], p. 8)，却并未说明“他”是谁、错误又是什么，这些空白都由道格拉斯加以填充。这种补充虽然让读者得以理解后续故事情节的发展，但也让读者无法单独依赖内层叙述来理解故事，从而削弱了女教师叙事的自主权。同时，道格拉斯对女教师的描述与手稿中的女教师的自我呈现存在明显落差。他口中的女教师是一个和蔼可亲并且有很强的工作能力的人，然而手稿内，弗洛拉惧怕与她见面，迈尔斯请求女教师不要再打扰他，女管家甚至认为她可怕可厌。这种反差提示读者道格拉斯的叙述可能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带有美化倾向——尤其是当他承认自己喜欢女教师时，这种可能性更为突出，道格拉斯描述的不可靠也进而影响了女教师叙述的可信度。

最外层的叙述者“我”同样没有保持中立。作为记录者，他不仅转述道格拉斯的讲述，还时不时跨层插入评论与解读，他在其篇幅不多的叙事中用显性的声音多次发挥了作为第一层叙事所享有的各种特权([2], p. 80)。例如强调女教师只见过两次面就陷入了爱情，并且说“她的爱情美就美在这一点”([1], p. 7)，甚至与道格拉斯一同将故事倾向性地解读为爱情故事。这些评论显然超出了框架叙述者的本分，直接干预了故事的主题指向。也就是说，虽然只是一个外层的对于道格拉斯转述内容的记录者，但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通过引用或概括道格拉斯所讲述的内容强化了自身在叙事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3], p. 229)。

这种多层次的嵌套结构，使女教师的叙述在抵达读者之前，已经历两次带有立场的加工。外层叙述者通过补足缺口、重塑人物形象、插入主题暗示等方式，在故事开篇就制造了信息的偏移与意义的倾斜。这种外部框架的干预让内层叙述的权威摇摇欲坠，也为后续由女教师自身叙事局限引发的不可靠性埋下了伏笔。

3. 内层叙述裂缝与叙述者的自我消解

外层叙述的结构性过滤已预设了可靠性危机，而女教师手稿内部的叙事裂缝则进一步自我印证了这种危机——这种双重机制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形成彼此强化的闭环。

构成小说核心故事层的是女教师的回忆手稿，手稿是回顾性叙述，本应借回望的清晰来增强可信度([4], p. 46)，但女教师从开头就不断暴露记忆中的空白，这在小说中的第三章多次被提及。例如，到布莱庄园的最初几周，她提到“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以至于我现在已难以记清”([1], p. 17)，而关于迈尔斯的学习安排，她则是说“我现在甚至记不清我曾经给他拟定过什么样的学习计划，以便假期一结束，就给他上课”([1], p. 18)，对于昆特的印象则是“我的视觉出现了混乱，以至于现在也无法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情景”([1], p. 20)。这些并不是单纯的记忆衰退，因为她能大量、准确地复现对话和心理细节，这说明问题不在于她记不清了，而在于她进行了选择性的呈现：她以模糊的词汇绕开关键信息，而非补全事实。

作为叙述者，女教师对事物和人的评价也是不统一的。依据费伦的三轴判断法，叙述者是否可靠在价值判断轴的体现，是叙述者在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立场是否合理和充分，而女教师对于事物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摇摆。从她的角度来看，布莱起初被描述成了童话里的城堡：“我还记得当时那十分令人愉快的印象，房子那开阔明亮的正面，敞开的窗户，窗户里挂着新窗帘，两个女仆正在朝外张望”([1], p. 9)。而不久后，布莱又在她眼中变成了“一座庞大、丑陋、式样古老却又方便适用的房子”([1], p. 12)。她评价的前后不一在人物评价上更为明显：弗洛拉从一个“有如拉斐尔画中的圣婴一般可爱而恬静”([1], p. 10)的孩子变成“一个令我感到害怕的怪物”([1], p. 86)。迈尔斯先被她认为目光清澈并且有礼节，随即却又被断言眼神与鬼魂昆特相似。这些转折并非建立在新的事实证据之上，而是由情绪牵引的重述：恐惧与猜疑增长，评价随之改写。读者据此很难把她的价值判断当作稳定的衡量标准，只能把它理解为当下情绪的显影。

在多方证词稀缺的语境里，旁证就显得尤为关键。每当女教师情绪化地认为孩子们在与幽灵勾连时，格罗斯太太总会出现茫然的神情，并表示认为女教师太累了，构成了一种冷静的反向证词：格罗斯太太并没有确认女教师看到了什么，而是在确认她的状态。从叙事效果看，文本把他者的反应安放在女教师的自我肯定之后，让读者同时接收两种互相竞争的解读：一是把她当作危机中的守护者，二是把她当作在恐惧里自我说服的讲述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便产生了一种张力，使女教师记忆中的空白以及评价的摇摆被放大为叙述可信度上的裂缝。

叙述的不稳定还体现在人称的转换上。女教师讲述时主要是第一人称，但关键处出现过自我客体化的人称跳跃——本该是“我”的位置，突然改写成“她”。例如小说中有一段描述为“他们的功课越来越好，这自然使我感到很高兴。他们想方设法帮我消除烦闷，快活开心”([1], p. 46)，这一段描述的英文原文为：“though they got their lessons better and better, which was naturally what would please her most—in the way of diverting, entertaining, surprising her”([5], p. 211)。可以看到，人称从I(我)转向了her(她)，这里的“她”指代的就是女教师本人。在这个瞬间，女教师从亲历视角转为旁观视角，仿佛与故事无关。视角的转换让读者意识到：讲述这件事的人，并不总是待在同一个叙述坐标上；她一会儿在事件之中，一会儿又跳到事件之外。这种在指称同一人物时所发生的语法人称转换，可以被视为一种更加显著的叙述偏离([6], p. 246)，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她对叙述者这一角色的自我疏离。

在人称滑移的基础上，还有一种过度的自证话语值得关注。她频繁用绝对性的表述来巩固叙述，例如“我有绝对的把握，我会再次看见曾经见过的那些东西”([1], p. 31)、“有时候，我敢发誓，两个孩子之中的一个会轻轻地、偷偷地推一推另外一个，说：‘她以为这一次她会这样做，可是她并没有做’”等

([1], p. 60)。但越是强调,我们就越能感到一种防御性的用力:如果有足够多的事实证据,就不必如此密集地申明立场。更何况,在缺乏物证以及他人的目击证词的情况下,这些自证话语不仅未能缩短她与读者的距离,反而制造了疏远:读者被推到一个只能相信或不相信的位置,却无法核查其真实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小说结尾女教师与迈尔斯的最后对峙场景。这一场景集中呈现了上述叙述裂缝的戏剧性后果。女教师一再追问迈尔斯:“你是不是会拿信?——或者别的东西?”([1], p. 179)、“那你在那里干了点什么?”([1], p. 180)等,她的语言愈加急切、逼迫,而迈尔斯的回应却愈加混乱与恐惧。叙述在此处的张力格外明显:女教师自认为是在拯救孩子、驱逐幽灵,但读者所看到的,也可以是一个成年女性以越来越强烈的情绪压力逼问一个孩子。迈尔斯最终的死亡并无任何客观的外力介入,女教师的叙述将其归因于幽灵的离去,而文本本身却为读者留下了另一种可能性:孩子死于极度恐惧之中。这一场景中权力、欲望(对昆特的执念)与恐惧的相互缠绕,使女教师叙述的不可靠性在文本细节层面得到了最集中的呈现,也使她的“守护者”身份与“威胁者”身份之间的悬置始终无法消解。

将这些特征合并来看,人称越界打破了叙述位置的稳定,自证话语又不断把读者推离核查现场,最后对峙场景则将叙述的内在张力推向了顶点。叙述者和读者始终不在同一观察面上,读者只能在她的语言里寻找事实的影子。女教师作为叙述者的内在裂缝,不仅让真相始终处于悬置状态,也为后续分析其在话语权层面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4. 不可靠叙事与话语权的消解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小说中,故事的入口和传播被外层男性叙述者结构化地把控;女教师自身的叙述以记忆空白、评价摇摆与视角转换呈现出内部裂缝。将这两点并置,可以看到一条并非偶然的逻辑:文本通过叙述制度性安排,把作为见证者的女性话语稳定地推向弱势位置,也就是说,女教师虽是故事的经历者与讲述者,却自始至终处于压抑、失语和被动的境地([7], p. 18)。

首先,话语进入读者视野的路径本身就是权力的分配。女教师的书写并非直接呈示给读者,而是作为一份被保存、被出示、被宣读的手稿进入公共场合;封蜡、交由道格拉斯保管、在围炉的男性聚会中被朗读——这些安排把谁先说、谁能把持叙事节奏这一关键权力交给了外层男性叙述者。道格拉斯和外层叙事者“我”分别展示着对各自叙事材料的掌控,从而把女教师的原始声音变为由他者引介的材料。正因为如此,女教师即便在文本内占据叙述主体,其话语却始终处于“被转述”的状态。外层的这种框架控制并不是要直接驳倒女教师,而是通过提供另一种更稳健的叙述声音,使她叙述中的裂缝更容易被读者读取为不可靠的依据。女教师在手稿中出现的模糊表述,本可被理解为创伤后回忆的自然断裂,但当这些语言被置于已由男性叙述者设定的解读框架中——道格拉斯的美化语气、外层叙述的主题暗示等,读者倾向于把模糊当作证据的缺失,把女教师的犹疑当作情绪失控。换言之,外层叙述者不必逐条辩驳内层叙述者的每一句话,他们只需维持一种相对冷静的叙事语气和可替代的解释方式,女教师叙述中的任一破绽便可能被重读为不可靠的标志。

其次,内层叙述中的人称转换与自我客体化并非纯粹的文体无力,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所处结构性处境被内化于自我表达的表现。女教师在手稿中有意把过去的“我”以“她”的方式置于外部审视之下,这一策略既是对当年无能为力的自我保持心理距离,也是对当下叙述中可能遭受质疑的防御性回应:女教师怀疑孩子们掩饰着他们的罪恶,但在缺乏外在见证的情况下,她只得压抑自己真实感受保持沉默([2], p. 83)。在多年后作为叙事者进行回忆时,以转换人称代词的方式把自己对象化,既能在叙述中保留心理距离来获得安慰,也隐含着对自身话语可能被否定的预期。与此同时这种自我分裂使得她的任何强烈辩驳反而被文本化为不稳定的证据,她在叙述中所呈现的被动与压抑,也在这一自我疏离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显露出来。

从社会语境来看，话语权的被压制并非只是叙事技巧上的安排，而是与女教师作为家庭雇员、社会弱位者的现实位置相连。在维多利亚时期，女家庭教师的地位虽略高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但所处境遇却十分尴尬。她们作为单身女性受雇于人，扮演的是母亲替代者的角色[8], p. 110)，在受到男主人骚扰的同时，还要承受女主人的敌视与轻蔑。在《螺丝在拧紧》中，女教师处于单人、依赖雇主的工作关系中，无法自由表达或对外求助，身边唯一的倾诉对象格罗斯太太还是一个文盲。能够为她发声并将其经历引介给公众的，恰恰是那些在社会交往场合占优的男性；而女性见证者被长期置于由他人引介、由他人归类的被动地位，其话语在结构上便难以获得对等的认可。

无论是外层叙述者对故事内容与节奏的掌控，还是内层叙述者在记忆、评价与视角上的自我削弱，都使不可靠叙事在文本中不仅是叙事策略的产物，也与小说的性别权力格局形成了深层的文本呼应。外层男性叙述者的转述与框架塑造，让女教师的声​​音始终通过他者之口进入公共视野；而女教师自身的犹疑与自我客体化，又在这种结构下被放大为可信度不足的信号。结果是，即便身处事件中心，她​​的话语依旧处于被动位置——这种阅读上的倾向性，恰与 19 世纪末期女性在话语层面所受的制约以及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文本呼应。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螺丝在拧紧》多层嵌套叙事的分析，揭示了外层男性叙述者对叙事路径、信息呈现及主题导向的把控，如何在结构上预设女教师叙述的可靠性危机；并指出女教师在记忆空白、价值判断摇摆与人称转换等内部裂缝中，进一步消解了自身话语的稳定性。这种外部框架与内部自我削弱形成的双重作用，使核心事件的唯一见证者始终处于被引介、被审视、被替代的境地。由此，不可靠叙事在小说中不仅是一种制造悬疑的修辞策略，更在叙事形式层面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在社会与文化话语中的弱势处境形成深刻呼应，揭示了叙事形式与话语权力结构之间的深层关联。

参考文献

- [1] 亨利·詹姆斯. 螺丝在拧紧[M]. 袁德成,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 [2] 朱萌. “讲故事”过程中的权力争夺——从叙事学角度探究小说《螺丝在拧紧》的性别问题[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32(4): 77-86.
- [3] Edel, L. (1966) The Point of View. In: Kimbrough, R., Ed., *The Turn of the Screw: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Essays in Criticism*, Norton, 229.
- [4] 王银瓶. 论《螺丝在拧紧》中的“不可靠叙述”[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0(1): 45-48.
- [5] James, H. (1996) *Daisy Miller, The Aspern Papers, The Turn of the Screw, The Beast in the Jungle*. Book of the Month Club, Inc.
- [6] Genette, G. (1988) *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7] 张文静. 《螺丝在拧紧》中的女性叙述主体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 [8] 薛阿三. 丧失的叙述主体——《螺丝在拧紧》中的家庭女教师[J]. 文教资料, 2007(24): 109-111.